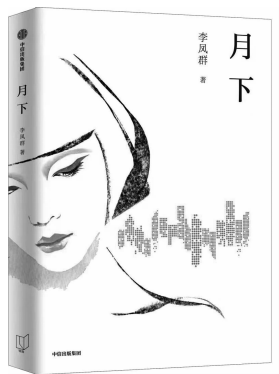


小城女性的狂飙式精神历险

□邓倩倩



李凤群
《月下》
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10月

李凤群果断地迈进虚构的迷雾里,在《月下》也掀起了小城女性的内在精神的狂飙,不动声色又绵里藏针。

《月下》的上卷是拥有华美而深邃世界的中年男人章东南步步为营地引诱不被看见的月城边缘人余文真,让她难以遏制地陷入虚幻的情网,如同大城市挟着繁荣与发达来入侵月城。十八岁女孩的目眩神迷尚情有可

原,二十五岁女人的神魂颠倒就趋向内耗挣扎。章东南与地震一同来到月城,在某种程度上是余文真情感天地的天灾,又矛盾地满足了她对不甘与慕大的渴求。在日益远离世俗生活的离轨日子里,余文真再也无法享受超然于蝇营狗苟日常的幻觉,需要有一场争取承诺的破冰行动。

在下卷里,余文真并没有与章东南对簿公堂,鱼死网破,而是慈悲地听他讲述自己失败的家庭关系。他曾努力营造见世面的精英人士的人设,却破坏了自己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后半生的尴尬困境,使得余文真看到他作为落魄的月城本地人的真实身份。余文真选择与王一鸣结婚,在这场婚姻里,余文真从忍耐走向反抗,再慢慢地学会如何让心灵变得通达。

小说并非局限在不对等的意乱情迷里,而是使命般地把现代化进程搬到舞台上,把个人性与社会性完美贴合。一方面,她用繁密锐利的笔端把余文真的心理世界翻了个底朝天:从一个深渊跌入另外一个深渊,潜入深处,明了深渊的结构,最后心明眼亮。另一方面,晚宴的杯盏交错里迸发出男性商人对于

月城的看法,他们尽兴畅饮又不忘拥抱成功与富裕的入侵,极力摆脱落后与无知。城市化声势浩大且名正言顺地落在月城,宛如轰轰隆隆的拆迁大卡车,碾压着月城固有的生存方式、文化根基,同时流水线般地对现代都市进行表面模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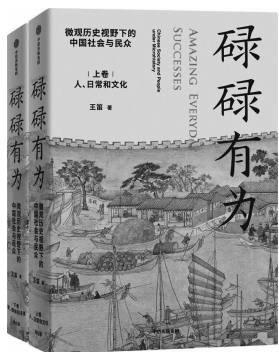
李凤群谈到过,章东南对于余文真的意义是“看见”。章东南的行动大于思想,一直在世界各地游走,而余文真困守月城,内心天马行空,行动迟迟跟不上思想。由是,余文真发现了一条“见世面”的渠道,她认识到天花乱坠名词后的虚妄可笑,了解月城的过去与未来,见证烂漫想象破灭成灰烬,领略婚姻的鸡零狗碎,也体味炽热爱恋背后的不堪与残酷。疼痛与矛盾作为常态在生活里蔓延,我们采取怎样的态度直接影响我们与时代、自我的关系,也是我们建构整体性的必由之路。如果没有“错误”爱情的介入,余文真很可能没机会对自我与生活有升腾的认知。她或许会在波动起伏的情绪下接受母亲的建议,找个知根知底的本地人耳鬓厮磨,拷贝父母的命运,形成一个稳固的舒适圈,从而避免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可能性。

对于非原生大城市的边缘小城女性而言,外面伟大壮丽的世界自发地形成一堵铜墙铁壁,成千上万“不被看见”的女人们通过升学读书、工作、婚姻试图“僭越”梦想与现实的界限,接着不得不面对大城市的距离感,以及相对应她们产生的凝视、防范、排斥的明确态度。幸运的话,她们在转折关头遇到了正向的机遇,活成余文真幻想已久的样子,获得融入大城市的入场券,拥有着中等偏上的生活档次。但是很多人与时刻无缘,在这一场没有试卷的考试里,大家不是光凭借一厢情愿的主观努力就可以取得理想的成绩,正如作者所言,“我们对生活的误解和误判无时不在,余文真式的波涛在何处涌动,虽不是人人可见”。

余文真从透明的自我认同到历经白日梦的绚烂与阵痛后,开始从他人的角度来看见自己、审视自己、教育自己,而不是一味沉溺在自怜自伤里,选择继续在漫长的人生之路跋涉。李凤群雕琢了小城边缘女性的显著特征,悲悯又不失理性地看待她们默默的不甘、挣扎与追寻,成功地完成了一部有关普通女性的狂飙突进的心灵史。

地气满满的微观历史世界

□禾刀



王笛
《碌碌有为》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10月

194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杨树因暑假到成都附近社会实习,在这里,她认识了40多岁的杜二嫂——一个以加工生丝、售卖丝绸谋生的底层农民家庭。次年,她完成了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半个多世纪后,杨树因的论文被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王笛发现,如获至宝,由此打开了一个通向微观历史世界的学术大门,至而“发掘”出大量充满浓厚民间地气的历史信息,并出版了《街头文化》

《茶馆》《袍哥》《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消失的古城》《那间街的茶铺》等多部地气满满、脍炙人口的微观历史著作。

本书共分上下两卷,上卷“人、日常和文化”聚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下卷“家、群体和法律”则讲述家族、群体和法律。上卷更倾向于底层社会个体,下层则由底层个体逐渐向家庭、族群以及更大社会活动面发展,这也折射出王笛教授的历史研究视角,即历史不是少数个人的独角戏,同时也是下里巴人的叙事。

历史有时就是一开始的不经意,结果被大家仿而效之,久而久之便形成习俗沉淀下来。今天国人对红木家具的膜拜,可能源自郑和下西洋返航用来压舱的红木。作为权力施加的对象,权力的一举一动,有时会成为下里巴人争相效仿的风向标。轿子原本是官员身份的象征,然而“先富起来”的商人纷纷模仿,终究遍地开花。抬轿子的虽是下里巴人,但他们创造出“把乘客抬到屋檐一样高”让人惊悚的“拱杆”方式取乐,这无异于以肢体语言对双肩压力的一种戏谑式反叛。

王笛教授的研究最初以四川盆地为中

心,许多作品难免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如此前出版的《茶馆》。茶馆不仅是各方信息汇聚的集散地,也是化解纠纷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人情世故表演的重要舞台。四川盆地四周全是山,“长途奔波,最常遇见的就是劫匪,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州里,都无法完全避免”。民国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当初出川求学,为求一路安稳,不得不与成群结队的挑夫同行。镖局最初出现虽在山西,但其针对的正是路途的凶险。

王笛教授的写作带有强烈的问题导向,每一章前会提出一系列读者可能关心的问题,每章结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再梳理再总结,这种有始有终的写作方式常常能给读者以醍醐灌顶之感。改革开放后,为什么浙江会率先成为民营企业的天堂?王笛教授从历史中觅得一些蛛丝马迹:“清代宁波城市居民中,有五分之四是劳动者和商人,其余五分之一为知识阶层;到了20世纪初,城区内30万人中,60%从事商业”,“可见,商业人口在城市市民中占比之大。”

为了生存,底层民众只能像成都的杜二嫂那样,在怕怕逼仄的空间里,也不放过一丝生存的希望。“19世纪一位外国人在广州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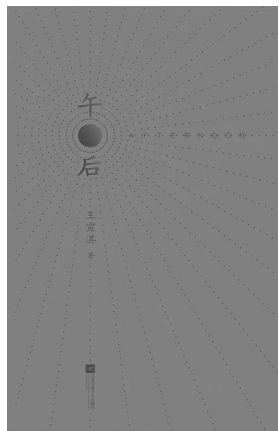
看到街道上门窗都是敞开的,屋檐都伸出一截。他同时比较了当时巴黎和广州的街道:在广州的街道上,商贩们本着对顾客充分信任的原则,将商品摆出来给顾客看,让顾客随便挑选,顾客们享受着充分选择的自由;而在伦敦或者巴黎的商店里,这是不太可能的”。遗憾的是,这样的商业精神并未因势利导,发展壮大。

传统习俗往往蕴含生存的“智慧”。民国“正不娶,腊不订”的风俗。因为正月走亲访友很忙,而腊月里忙着准备春节,娶亲订婚这样的仪式只能在农闲时举行。然而同样出于现实需要,这些风俗早就改弦更张,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由于平时工作忙难以请假,反倒选择春节回家结婚,至于“订婚”一俗早就送进了历史的故纸堆。

透过王笛教授的文字,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历史既有山川大海,也有纵横阡陌,大人物的叙事无以取代下里巴人的命运悲欢。相较于上层社会经常遭遇的血雨腥风,底层社会的变化则要漫长得多,也细微得多,有的历经岁月淘洗,跨越时空,最终沉淀为公众喜闻乐见的习俗。从这层意义上讲,习俗又何异于一部活历史。

奔跑或停留

□赵步阳



王宣淇
《午后》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2年5月

王宣淇的诗歌中,马、鹿和老虎都是出现比较多的动物意象。这么说,并不是说其他的动物意象没有出现在她的诗歌中,当然也有,猫、狗、兔子,还有鸟,以及最优雅的鹤,也都在她的笔下走过或飞过。但是在我来看,它们仅仅是走过或者飞过,这些动物似乎只是女

诗人生命中的过客,她只是它们的旁观者。而那些马、鹿、老虎,和偶一出现的孤鲸,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最为奇特,其中混杂着来自女性诗人或女性的孤独、慌乱、分裂,以及巨大的神秘与完整,读来真是让人过目不忘。停留的当下,怀念着奔跑的过去,期待着不可知的春天,失落在虚无的现在,却依然倾尽全力承受着和托举着心中的海。

王宣淇的笔下,马是最经常出现的,也许《语马者》是她的自况,“不停地写马、夜晚/与树林”,但是更有可能,“马”就是她的自况,“它们低语/对着希腊的河/它们不动/随我们揣测/它们也是我们/纯粹的我们/和不得不纯粹的它们”(《雕塑展》)。有时候,王宣淇诗句中出现的马,是那些很累的马,是用沙子堆出来的白马,被海浪与美人鱼一起吹走,是躺下的时候想起的山崖下的马。但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受伤的马的形象,在《打马》中,诗人“一早起来就打自己的马/直到雪亮的皮毛渗出血点”,而在《女性意识的土丘》中,诗人则明确地指出,“我是你的牵来的马/在浓烟的沙漠上跛足”,这些受伤的马,似乎从未在奔跑,它们总是以停顿或被动的

形象被诗人捕捉到,再出现在她敏感的诗句中。

老虎在女诗人的诗句中,则是以怪诞温柔的面貌出现的,有时候,老虎是一朵云,有时候,诗人甚至是以猫触发了老虎的想象:从一只明城墙下走过的猫,“诗人以及画家何玲/她们谈到了宋画以及老虎”(《南京篇章(三)》),从梦中的白色的猫,诗人描述出了一只温文尔雅的老虎形象,“虎掉在我腰上//竹林里,它趴着/吞咽着一篇篇毛笔写的诗”(《这不可能》)。而在《虎》这首诗里,坐在路边的虎,干脆在吃完剩下一半的汉堡、喝完可乐以后,乘着可能的月色,走起了猫步。那毕竟是只老虎啊,在这样的时刻,你如果不能说这只老虎是分裂的,那么,她/它就是完整的。你如果说“猫”是诗人喜爱的动物,你也不可能不承认,在诗人的内心,还蛰伏着一只温柔的老虎。

我曾经在很多年前,在紫金山中撞见过一只小鹿,就在湖边的树林里,当它突然出现,当我和它四目相对,那一瞬间我和它都慌了。多年后,我在王宣淇的诗中,又一次遇见了桃花盛开的春天里的这只小鹿。王宣淇诗

歌语言中的一种机灵和敏锐,在这首诗中最清晰地展现出来:“桃花开了/满山都是寻找风景的人/山下面/两个孩子/正要接近一头鹿/这是它的第一个春天/她们和它/都忍不住要颤抖”(《桃花开了》)。和我见到的那只鹿不一样,这只颤抖着的鹿停在那里。也许它也在慌乱着,也许它下一秒就会扭头跑开,也许永远不会。

《孤》写了一只孤独的鲸鱼。在诗中,诗人已经非常清楚地借孤鲸以自指。“夜车的鸣笛”就是它孤独的声音,如果我们忽略这一暗喻可能的不恰当——毕竟在当下的城市,“夜车的鸣笛”是吵闹、混乱而不是穿透性的,如果我们想象诗人身处的是疯狂美丽都的地下,在那一片喧嚣中暗暗生长,那么,这只孤鲸毫无疑问地向我们揭示了现代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她们拥有的清醒、勇气与力量。这只伟大的孤鲸,虽然已经长出了翅膀一样的鳍,但是,它并没有从一片海游到另一片海,它似乎是被禁锢于此。停留于此的它,内心清醒而自持,海洋已经从它的心底漫出。显然,这只孤鲸的形象是如此完整而有力,深具静穆之美。